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重点教材

MAJOR TEXTBOOKS FOR POSTGRADUATE STUDENT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国传统哲学纲要

An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李存山◎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重点教材

MAJOR TEXTBOOKS FOR POSTGRADUATE STUDENT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国传统哲学纲要

An Outlin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李存山·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传统哲学纲要 / 李存山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重点教材系列)

ISBN 978 - 7 - 5004 - 7487 - 6

I. 中… II. 李… III. 哲学—中国—研究生—教材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4658 号

责任编辑 李树琦

责任校对 王桂芳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960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438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重点教材工程领导小组

组 长：陈佳贵

副组长：武 寅

成 员：陈佳贵 武 寅 黄浩涛 施鹤安 刘迎秋

秘书长：刘迎秋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重点教材编审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主 任：刘迎秋

副主任：王 巍 王逸舟 李培林 金 碚 侯惠勤
党圣元

委 员：于 沛 牛凤瑞 王 巍 王国刚 王建朗
王逸舟 任宗哲 刘迎秋 朱 玲 江时学
邢广程 张车伟 张汉亚 张星星 张宇燕
李 扬 李 周 李 林 李国强 李培林
杨 光 汪同三 沈家煊 陆建德 陈祖武
陈 淮 陈光金 房 宁 罗红波 金 泽
金 碚 侯惠勤 姚喜双 洪银兴 胡国成
逢锦聚 党圣元 唐绪军 袁 卫 顾海良
高培勇 曹宏举 黄 行 朝戈金 舒 元
蒋立峰 谢地坤 靳 诺 蔡 昉

总 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经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批准于 1978 年建立的我国第一所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生院，其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1998 年江泽民同志又题词强调要“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办成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基地”。在党中央的关怀和各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持续健康发展。目前已拥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哲学、法学、社会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等 9 个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68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和 78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自主设置硕士学位授权点 5 个、硕士专业学位 2 个，是目前我国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设置最完整的一所研究生院。建院以来，她已为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绝大多数已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有的已成长为国家高级干部，有的已成长为学术带头人。实践证明，办好研究生院，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文和社会科学人才，不仅要有一流的导师和老师队伍、丰富的图书报刊资料、完善高效的后勤服务系统，而且要有高质量的教材。

20 多年来，围绕研究生教学是否要有教材的问题，曾经有过争论。随着研究生教育的迅速发展，研究生的课程体系迈上了规范化轨道，故而教材建设也随之提上议事日程。研究生院虽然一直重视教材建设，但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研究生教材建设未能跟上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因此，组织和实施具有我院特色的“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重点教材”工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重点教材工程”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经过几年的努力，先期研究、编写和出版 100 部左右研究生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教材，力争使全院教材达到“门类较为齐全、结构较为合理”、“国内同行认可、学生比较满意”、“国内最具权威性和系统性”的要求。这一套研究生重点教材的研究与编写将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分类相衔接，以二级学科为主，适当扩展到三级学科。其中，二级学科的教材主要面向硕士研究生，三级学科的教材主要面向博士研究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重点教材的研究与编写要站在学科前沿，综合本学科共同的学术研究成果，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坚持学术性和应用性的统一，强调原创性和前沿性，既坚持理论体系的稳定性又反映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既照顾研究生教材自身的规律与特点又不恪守过于僵化的教材范式，坚决避免出现将教材的研究与编写同科研论著相混淆、甚至用学术专著或论文代替教材的现象。教材的研究与编写要全面坚持胡锦涛总书记在 2005 年 5 月 19 日我院向中央常委汇报工作时对学院和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提出的要求，即“必须把握好两条：一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根本指导思想。老祖宗不能丢。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二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极推进理论创新”。

为加强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重点教材工程的领导，院里专门成立了教材编审领导小组，负责统揽教材总体规划、立项与资助审批、教材编写成果验收等等。教材编审领导小组下设教材编审委员会。教材编审委员会负责立项审核和组织与监管工作，并按规定

特邀请国内 2—3 位同行专家，负责对每个立项申请进行严格审议和鉴定以及对已经批准立项的同一项目的最后成稿进行质量审查、提出修改意见和是否同意送交出版社正式出版等鉴定意见。各所（系）要根据教材编审委员会的要求和有关规定，负责选好教材及其编写主持人，做好教材的研究与编写工作。

为加强对教材编写与出版工作的管理与监督，领导小组专门制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重点教材工程实施和管理办法（暂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重点教材工程编写规范和体例》。《办法》和《编写规范和体例》既是各所（系）领导和教材研究与编写主持人的一个遵循，也是教材研究与编写质量的一个保证。整套教材，从内容、体例到语言文字，从案例选择和运用到逻辑结构和论证，从篇章划分到每章小结，从阅读参考书目到思考题的罗列等等，均要符合这些办法和规范的要求。

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大批量组织研究和编写这样一套研究生教材，在我院是第一次，可资借鉴的经验不多。这就决定了目前奉献给大家的这套研究生教材还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不足、疏漏甚至错误。在此，我们既诚恳地希望得到广大研究生导师、学生和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更热切地欢迎大家对我们的组织工作以及教材本身提出批评、意见和改进建议，以便今后进一步修改提高。

陈佳贵

2005 年 9 月 1 日于北京

前 言

中国传统哲学，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它是中国古代的，但作为中国的思想传统，又深深地影响到中国近现代乃至未来哲学的发展。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哲学”之名，相应地也就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哲学”这样一个“学科”。因此，自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学科于20世纪初建立后，就发生了关于“中国哲学史”之名称的“困难”，近年来又有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与这一问题相联系的是，还有中国传统哲学有无“系统”或“实质上的系统”，以及中国传统哲学有什么特点等问题。以下，笔者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并对本书的写法略作说明。

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哲学”之名，但有“哲学”之实。我们现在所用的“哲学”一词是个译名，它出自日本近代思想家西周对 philosophy 的翻译，其在古希腊语中的意思是“爱智”。西周先把 philosophy 翻译为“希贤学”或“希哲学”，是取宋儒周敦颐在《通书·志学》中所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之意，即把 philosophy 理解为“希求贤哲之智之学”^①。在1874年出版的《百一新论》中，西周始把 philosophy 译名为“哲学”，他说：“将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法的 philosophy 译名为哲学。”^②应该说，“哲学”这个译名的成立一开始就具有了会通中西文化的特点。如果没有中西文化的会通，那么就只有 philosophy，而没有“哲学”。

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个名词，但是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知人则哲”和“哲人”的表述。“哲”的意思就是“智”或“大智”（《尚书正

^① 钟少华：《清末从日本传来的哲学研究》，载《世界哲学》2002年增刊。

^② 卞崇道、王青主编：《明治哲学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按“教法”，西周是“以治人者为法，以导人化善者为教”，见同书第14页。

义·皋陶谟》),而“哲人”乃指“贤智”之人(《尚书正义·伊训》)。孔子在临终时曾慨叹而歌:“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记·孔子世家》)可见,哲学的“哲”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其深远的根源。在春秋时期,“智”或“大智”就是对“道”的追求和体认,所以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孔子临终称自己为“哲人”,依现在所说就是“哲学家”的意思。西方现代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1957年出版《大哲学家》一书,其中按“思想范式的创造者”、“思辨的集大成者”和“原创性形而上学家”的分类,评述了十多位世界型“大哲学家”的思想,在“思想范式的创造者”中有孔子,在“原创性形而上学家”中有老子^①。孔子和老子不会想到,他们作为“大哲学家”,在约2500年之后能得到世界性的承认。

“中国哲学史”作为一个学科,是在北京大学于1912年设“哲学门”而建立的。当时,哲学门之下分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两类,起初因没有讲授西洋哲学的教授,故1914年正式招生时有所谓“中国哲学门”之称。此后,有陈黻宸、马叙伦等讲授“中国哲学史”,有谢无量在1916年出版《中国哲学史》。而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最具有意义的是,胡适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冯友兰在1931年出版《中国哲学史》(上册)并在1934年出齐此书的上下两册。

蔡元培在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的“序”中说,此书的“特长”主要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和“系统的研究”。而“扼要的手段”就是“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所谓“系统的研究”,因为“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所以“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②。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上册)的“绪论”中指出,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但有“实质上的系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此所谓“找出”,仍不免要“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即找出“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他又认为,中国古代所讲“性

① 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李雪涛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蔡元培“序”,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1页。

与天道”及其“为学之方”的那部分内容，“约略相当于”西方哲学所讲的宇宙论、人生论和方法论。^①

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建立之初，胡适和冯友兰都是为了强调“中国哲学史”之名的现代意义，而侧重于讲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同”即普遍性。于是，金岳霖先生在为冯著写的“审查报告”中就不免提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仍有“困难”，“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他举出写中国哲学史至少有两个根本态度：“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发现于中国的哲学。”“根据前一种态度来写中国哲学史，恐怕不容易办到”，而胡适和冯友兰都是取第二种态度，即“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学史”^②。虽然金先生对冯著有较高的评价，但冯先生未必同意金先生的观点。因为冯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所讲的“性与天道”等等“约略相当于”西方哲学所讲的宇宙论、人生论。既然是“约略相当于”，这里就有“异同的程度问题”，如果能讲出中国哲学之“异”，那它就不仅是“在中国的哲学史”，而且是“中国哲学的史”。

金先生在冯著的“审查报告”中还说：“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通的哲学问题”，这虽然“有武断的地方，但是这种趋势不容易中止”^③。据此，上述金先生所谓“普遍哲学”，实是把西方哲学“当做普通的哲学”。

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金先生的“审查报告”对于张岱年先生在1937年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有重要影响。金先生对冯著提出的问题，正是张著在“序论”中首先要解决的。于是，不同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的先讲“哲学的定义”，也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绪论”的先讲“哲学之内容”，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的“序论”首先有“哲学与中国哲学”一节，也就是首先要解决“哲学”的普遍性和“中国哲学”的特殊性问题。张先生说：

如所谓哲学专指西洋哲学，或认为西洋哲学是哲学的唯一范型，

①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2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8—249、252—253页。

② 同上书，第617—618页。

③ 同上书，第616页。

与西洋哲学的态度方法有所不同者，即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中国思想在根本态度上实与西洋的不同，则中国的学问当然不得叫作哲学了。不过我们也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入此类者，都可叫作哲学。以此意义看哲学，则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①

张先生把“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西方哲学为“唯一的哲学范型”，第二种是“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西方哲学只是此类的一个“特例”。这后一种看法也就是要避免“武断”地把西方哲学当做“普遍哲学”。依后一种看法，中国古代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理论即使“在根本态度上”与西方哲学不同，也仍可“名为哲学”。它与西方哲学同属“哲学”之类，而各是其中的“特例”。《中国哲学大纲》又名“中国哲学问题史”，它所讲的不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通的哲学问题”，而是“在探寻问题的时候，固然也参照了西方哲学，但主要是试图发现中国哲学固有的问题，因而许多问题的提法与排列次序，都与西方哲学不尽相同”^②。

关于中国哲学的“条理系统”，张先生肯定冯友兰先生“谓中国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而有实质上的系统，实为不刊之至论”。《中国哲学大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寻出整个中国哲学的条理系统”，张先生强调，“求中国哲学系统，又最忌以西洋哲学的模式来套，而应常细心考察中国哲学之固有脉络”，“我们对于中国哲学加以分析，实乃是‘因其固然’，依其原来隐含的分理，而加以解析，并非强加割裂”^③。显然，这里已经不是片面强调“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了。在《中国哲学大纲》“序论”的第三节，张先生讲“中国哲学之特色”，如“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等等^④，这就是讲中国哲学之“异”即特殊性，强调它是“中国系的

①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序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② 同上书“新序”，第6页。

③ 同上书“自序”，第18—19页，“序论”，第4—5页。

④ 张先生说：中国哲学之特点，重要的有三，即“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次要的有三，即“重人生而不重知论”、“重了悟而不重论证”、“既非依附科学亦不依附宗教”，并注明关于“合知行”、“同真善”、“重了悟而不重论证”的解说，“颇采熊十力先生之意”。同上书“序论”，第5—9页。

哲学”，而非“西洋系、印度系”的哲学。

有了哲学的“类名”（普遍性）与“特例”（特殊性）之分，“中国哲学”之名方可安立。金岳霖先生在1943年用英文写成《中国哲学》一文，提出中国哲学的特点是：“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天人合一”、“哲学与伦理、政治合一”、“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①，所论甚精。显然，金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不认为“中国哲学”的名称有“困难”了。

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中首讲“中国有没有哲学”，认为“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都有它的哲学；否则，它便不成其为文化体系”^②。他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首讲“中国哲学之特殊性问题”，而此问题的前提就是“哲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一定要普遍性、特殊性两面都讲，不能只讲一面”^③。这也是要安立“中国哲学”之名，虽然它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质”或“特殊性”，但从“普遍性”上讲它仍堪当“哲学”之名。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仅有“异”，而且有“相似点”。因为有“相似点”，所以才有“哲学”这个类名。“哲学”之名本身就与西方的 philosophy 有一种“连类”的关系，如果中国之“哲”与西方之“智”完全不搭界，那么就只有 philosophy，而没有“哲学”。我们现在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带有反对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的意味。有此意味，就不应把西方哲学当做“唯一的哲学范型”。更何况从事实上说，西方哲学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发展（如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海德格尔哲学和莱维纳斯哲学等等），为中西哲学提供了更多的“相似点”，甚至“在根本态度上”也有向东方哲学靠近的倾向，中国古代有“哲学”当是无疑义的（除非固守 philosophy 的“话语霸权”，抑或对 philosophy 这个“学科”本身抱有成见^④）。

① 金岳霖：《中国哲学》，中译文载《哲学研究》1985年第9期。

②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③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④ 如法国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德里达认为，哲学就是古希腊探求所谓“逻各斯”的传统，哲学是西方独有的，西方之外绝无哲学。面对中国学者的不同意见，他又说，这并不代表中国没有“思想”，中国的“思想”并不比西方的哲学低级。贾海涛《从“合法性”到形而上学》，《文化中国》2006年第2期。

二

中国哲学的“实质上的系统”是什么？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所讲“性与天道”及其“为学之方”的那部分内容“约略相当于”西方哲学所讲的宇宙论、人生论和方法论。这当然是“参用”了西方哲学的“三分法”^①，但这种“三分法”是否就违背或曲解了中国哲学的“实质上的系统”呢？我认为，未必然也。

张岱年先生也认为，中国哲学所讲的“主干”内容“可以约略分为宇宙论或天道论，人生论或人道论，致知论或方法论”，“总此三部分，正相当于西洋所谓哲学”^②。这里所说的“相当”，可以理解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相似点”，或中西哲学共有的普遍性。正是因为有此普遍性，才有了“哲学”这个类名，日本学者西周才可以“将论明天道人道，兼立教法的 philosophy 译名为哲学”。

Philosophy 的本意是“爱智”，但是对于 philosophy 这个学科的定义及其研究的内容、范围等等，在西方学术界也是言人人殊。直到 1970 年，瑞士学者皮亚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写一部关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报告，仍然说哲学学科“是极其难于分类的一组”，“因为献身于这类学科的学者们对应归入这一名称之下的各分支的意义、范围、甚至统一性，意见颇不一致”^③。在美国近年出版的一本《哲学概论》中，第一章的题目是“何谓哲学”，但作者沃尔夫并没有给“哲学”下定义，而是讲“哲学家究竟做什么”，经他对西方哲学史的宏观考察，认为哲学家就是“研究人性”和“研究宇宙”，这是西方哲学的“两大主轴”或“两大分支”，“但是我们不能以为它们的发展是互不相关的”，“哲学家最重要的是追求〔两大分支〕的统一性”^④。沃尔夫说，在悠久的西方哲学史中，“哲学家曾经尝试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将哲学的两大分支结合成相互联结的整体”，第一种策略为西方早期的一些哲学家所尝试，即诉诸“逻各斯（logos）的理性能力之存在与运作”，由此产生了“西方思想中最重要的

①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 2 卷，第 248—249 页。

②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序论”，第 3 页。

③ 让·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郑文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 页。

④ 罗伯特·保罗·沃尔夫：《哲学概论》，郭实渝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21 页。

哲学观念——自然法（nature law）的观念”，第二种策略则是“17、18 世纪在不列颠群岛与欧陆的一群杰出哲学家来完成的”，即诉诸知识论（theory of knowledge）或认识论（epistemology），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对人性的研究与对宇宙的研究结合起来”^①。

我国台湾学者邬昆如等近年也出版了一本《哲学概论》，作者对哲学的“三史”即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和印度哲学史作了综合的考察，在回答“什么是哲学”的问题时，作者认为“哲学”在理论上就是“定位宇宙”，然后在宇宙中“安排人生”，“哲学”在实践上就是教人学习“做人”、“处事”的学问总纲^②。

尽管不同的哲学家对于“什么是哲学”和“哲学家做什么”会有不同的理解，但哲学主要是研究宇宙、人生和认识的根本问题，这是有较多共识的见解。胡适、冯友兰、张岱年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提到不同的哲学家对于“哲学”的定义各不相同，但也都取了一个有较多共识的说法。如胡适说：“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著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这里说的“人生切要的问题”，包括了“天地万物怎样来的”、“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等等^③。冯友兰说，哲学之内容包含“三大部”，即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④。张岱年说：“哲学是研究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⑤ 参照上述两本《哲学概论》，应该说他们对哲学的定义和内容的表述至今仍然可以成立。

宇宙和人生的根本原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就是关于“天道”与“人道”的学问。中西哲学都以此为“两大主轴”或“两大分支”，这是中西哲学的普遍性。因此，西周可以说“将论明天道人道……的 philosophy 译名为哲学”。亦因此，我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可以称为“天人之学”。与西方哲学不同的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特点是“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但亦决非没有”^⑥。中国古代哲学家追求“两大分支”的统一性，

① 罗伯特·保罗·沃尔夫：《哲学概论》，郭实渝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1—25 页。

② 邬昆如主编：《哲学概论》“序”和“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3 页。

③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 1—2 页。

④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 2 卷，第 246 页。

⑤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序论”，第 1 页。

⑥ 同上书“序论”，第 3 页。

即“天人合一”，是采取了“推天道以明人事”的“策略”，此策略不同于西方哲学的“逻各斯”传统^①，更没有像西方近代哲学那样诉诸知识论或认识论的方法。后一种不同也就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的一个原因。

从中西哲学的普遍性和中国哲学的特殊性来说，中国传统哲学就是“天人之学”，其“实质上的系统”可以说主要就是讲明“天道”与“人道”，并以“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方式来追求“天人合一”。从先秦至清代，贯穿中国传统哲学的主题是“究天人之际”，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天人合一”。如在金岳霖和张岱年列出的中国哲学特点中都有“天人合一”或“一天人”，金先生说：“多数熟悉中国哲学的人大概会挑出‘天人合一’来当做中国哲学最突出的特点。”亦如汤一介先生所指出：“‘天’与‘人’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基本的概念，‘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基本的命题，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哲学家都以讨论‘天’、‘人’关系为己任。”^②

中国传统哲学是“天人之学”，而其特殊性又在于，它的中心和宗旨是“知人”和“爱人”。这在《尚书·皋陶谟》所谓“知人则哲”、“安民则惠”的表述中就已经开其端。《皋陶谟》记载帝舜与皋陶、大禹讨论政务，皋陶说：“在知人，在安民。”大禹说：“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意谓知人则明智，能任用贤人；安民则有恩惠，人民便感怀之）在这里，“知人则哲”、“安民则惠”是古之“道术”尚未分裂时“学在王官”的一部分，其所谓“知人”即一般所说“知人善任”的意思，还称不上是正规的“哲学”思想。但是在春秋时期（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的“哲学的突破”中，儒家思想仍然继承了这个“基因”。《论语·颜渊》篇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智），子曰：‘知人。’”孔子所谓“爱人”、“知人”已经是古之“道术”分裂之后儒家的哲学思想，此思想与“知人则哲，能官人”有联系。且看，“樊迟未达”，孔子指点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

① 沃尔夫说：“在宇宙中，这个‘逻各斯’通常等同于我们今日所说的‘上帝’，但是它也可等同于每个人身上的理智能力。……我们的理性能力可说是充满并统治宇宙的神圣逻各斯（diving logos）的一点火花（spark）或碎片而已。这个古希腊学说终究被基督教、犹太教和回教等宗教的神学所吸纳，并且为中世纪蓬勃发展的宗教神学奠定了基础。”见氏著《哲学概论》第22页。

② 汤一介：《我的哲学之路》，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问孔子所说“何谓也”，子夏说：“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孔子的指点和子夏的解说，就是“知人则哲，能官人”的意思。而皋陶和大禹所说的“安民”，在孔子的思想中则为“修己以安人”或“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

孔子所谓“智”在“知人”，相当于说“知人则哲”（“哲”的字义就是“智”或“大智”，《史记·夏本纪》将大禹所说的“知人则哲”记为“知人则智”）。但孔子所谓“知人”，其义不仅在于“能官人”；“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只是孔子对于“知”（智）的指点语，而非定义语。实际上，孔子所谓“仁者爱人”，是对于“人（类）”的普遍之爱；其所谓“智”在“知人”，也是对于“人（道）”的普遍之知。

儒家哲学是以“知人”为中心，以“爱人”为宗旨，但儒家哲学又不仅限于“知人”和“爱人”。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不惑”可谓是“知人”的境界，而“知天命”就不是“知人”所限了。《中庸》云：“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从“知”的范围来说，不仅是“知人”，而且是“知天”；从“知”的宗旨来说，“知天”也是为了“知人”。孟子说：“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忧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孟子·尽心上》）这里所谓“无不知”，当然是既“知天”也“知人”，但当务之急是“知人”，尤其是知人之“性善”；所谓“无不忧”，是要遍爱所有的人，但当务之急是“亲贤”，亦即“能官人”。从孟子对“尧舜之知”和“尧舜之仁”的表述中，我们仍能看到“知人则哲，能官人”的影响（这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中国古代‘哲学的突破’是以‘王官之学’为其背景，而且‘突破’的方式又复极为温和”^①）。孟子又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就是由“爱人”而进至泛爱万物了。

郭店楚简的《语丛一》云：“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察天道以化民气。”“《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易传·系辞上》亦云：“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周易》的这一“推天道以明人事”^②的哲学架构，是儒家与道家在思想的互动中共同建构起来的（儒家的“天

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序》：“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易》则寓于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